



袁和平文集

第三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和平文集 (三卷) / 袁和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63 - 5671 - 8

I. ①袁… II. ①袁…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605 号

袁和平文集 (三卷)

作 者: 袁和平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林德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福州华悦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00 × 280

字数: 1586 千

印张: 57.125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671 - 8

总定价: 150.00 元 (全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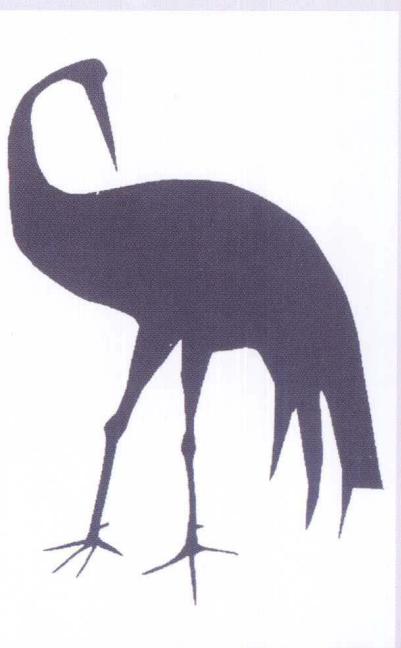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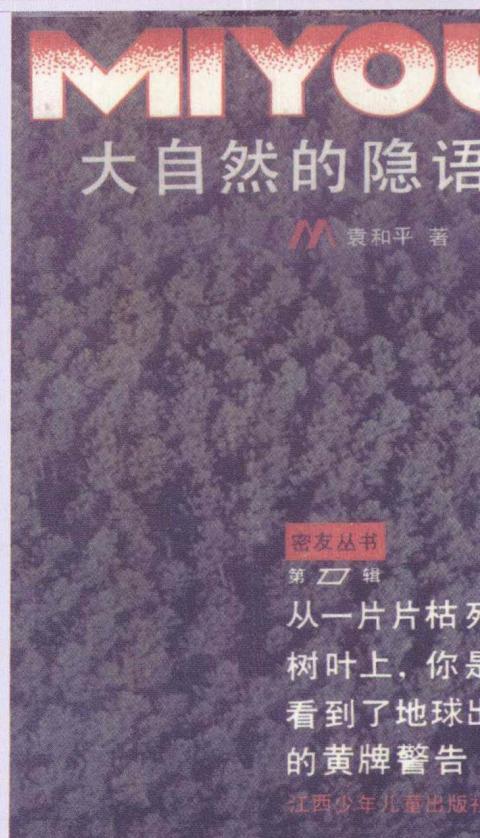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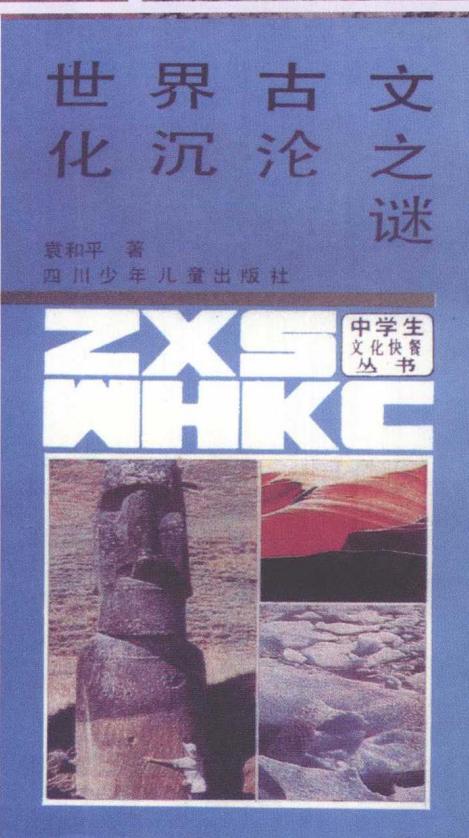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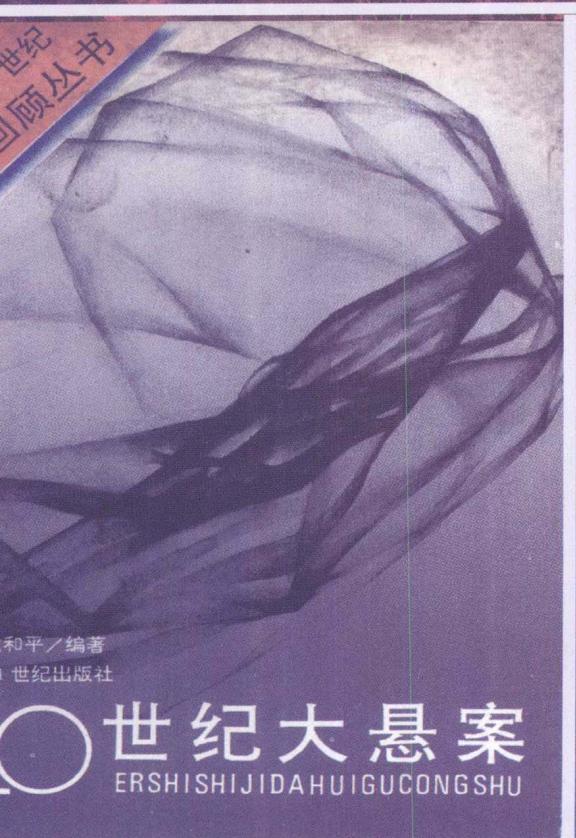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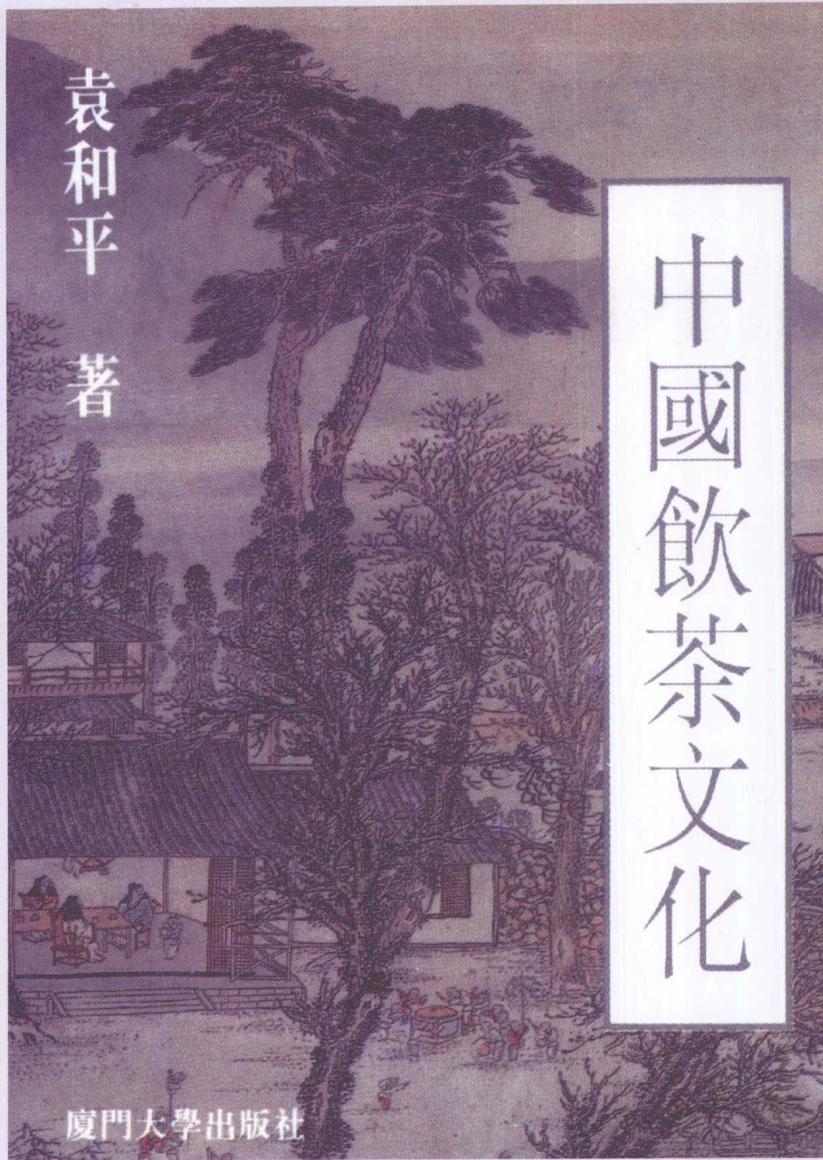


馬到成功





中國飲茶文化



目 录

- 中国饮茶文化/003
- 现代眼看妈祖/071
- 大自然的隐语/119
- 20世纪大悬案/163
- 世界古文化沉沦之谜/261

编 后/297

中 国 饮 茶 文 化

从野茶到园茶

人类认识植物，应当早于动物，这是受生产能力所决定。我们祖先在渔猎时代的原始劳动，以追捕动物，与野兽搏斗，或以逃脱猛兽攻击，以此获取肉食度日。这与采集阶段的劳动相比较，渔猎时代的劳动充满着冒险与牺牲，其代价当然高昂。爬到树上采摘野果，躬身于大地挖掘植物的根茎，不仅没有死亡与伤残的危险，更主要的是，这项劳动老幼都能参与，它扩大了人类的生存途径。

但是，自然界植物的枯荣兴衰，丰产歉收等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春华秋实，夏日百草丰茂，冬季万物凋零，一年之中许多时间无物可采集。而捕渔与狩猎不受季节困扰，一年四季均可进行。渔猎与采集在季节交替过程，以调济互补的方式长期并存。直到畜牧业和种植业出现，人类才结束了绝对依靠自然的历史。采集与渔猎这两个性质不同的生存阶段，究竟谁在先谁在后，探讨这个问题并无实质意义，关键是人类由猿类进化而来，猿类巢居树穴，它在遗传基因里就深深积淀着认识植物的原始记忆。

于是，在中国古代神话里，有关茶起源的说法，便显得那么朴实——“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

神农是中国远古时期的种植之神、栽培的先祖、丰收之神，凡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一切发明创造，人们都把功绩集中他一人身上。他是广大原始先民在漫长的与自然斗争岁月，集体塑造出来的一尊神灵。这既反映了原始先民对神灵与英雄的崇敬，也记录了洪荒岁月生存的艰难。

有关神农发现茶的传说有多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说，神农替群众除病祛灾足遍群山，搜遍百草，并亲自品尝各种植物的药性与疗效。有一次他在煮水时，几枚茶叶飘落锅中，他无意品尝了几口，不料锅中的茶汤清香异常，饮则满口生津，精神振奋，其性果然不仅可以做药，而且还是一种可口的饮料，另一种说法认为，有一次神农在山中采药，不慎误食毒草中毒倒在一株茶树下，昏迷不醒，奄奄一息。这时候，从茶树叶上滴落的露珠，正好滴入他口中。奇迹出现了，毒液不仅得以排除，神农得救了，并且从中还受到了启发，把茶介绍给人间，饮了百病皆能医治。

围绕神农发现茶，不管传说有多少种，神农中毒是所有传说的核心内容。无论何种传说，都有这个内容，十分符合采集阶段的劳动特点，采集阶段的劳动，充满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与认识，它需要有冒险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的。动物与飞禽的肉可食，水中的鱼虾贝螺亦在可食之例，山中的野果，林中的菌类，尽管无需搏斗与追杀即可获取，但品尝的勇气不亚于一次猎虎。

神农误食中毒是各种远古传说的核心内容，而得茶而解，又是各种传说的集体归宿。这反映了茶在当时被人们视为一种药物。同时，茶在这些传说中的另一项共同特征，即茶是一种并不为人熟知的野生植物。

我们很难断然分划出采集渔猎与畜牧栽培阶段的具体界线，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推断

出，我们四千年前的祖先就认识茶了。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诗句：“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这里的“荼”就是茶。茶在古代既然被认为是一种解毒的良药，它必然被视为珍品。事实上，在祭祀滥觞的周朝，茶就是皇家贵族的祭品。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元年就有“掌茶”“聚茶”以供祭丧的记载。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茶尽管仍被视为祭品，但也开始被当作食品了。《晏子春秋》说：“婴相齐桓公时，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茗，又是茶的古时别称，现今不少地方仍称茶为茗。《晏子春秋》中这段记载，说的是齐桓公喜食用茶叶炒制的菜肴。将嫩茶炒食，至今仍是一些地方的风味佳肴。

西汉时期贵族饮茶成风。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份茶叶文献，是一份买卖奴隶的契约，称《僮约》。这是一份相当有价值的文件。《僮约》为王褒所写，他是西汉时期四川资中一带的儒士。王褒到成都赶试，寄居亡友杨氏家中，时常差遣杨妻家僮买酒，家僮颇为不满。不久，杨妻将家僮卖给王褒，王褒写下契约，规定家僮每天必须从事的工作。其中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具”句。武阳，即今天的四川省彭山县东一地。“武阳买茶”意思即规定家僮必须无条件去武阳购买茶叶，“烹茶尽具”意思是说沏茶盛茶时必须洗涤整理饮茶器具。

《僮约》的记录，从侧面反映出西汉时期四川资中一带就有专门卖茶的茶市，可见当时四川某些地区茶叶生产已具相当水平。同时，王褒对饮茶杯具的讲究，又反映了当时饮茶的水平。假如上述《诗经》与《晏子春秋》所记述的茶事，仅仅是一种自生自灭的野茶，那么，到《僮约》所记载的茶，则是人们有意经营的园茶了。

茶树原为温带的高山植物，由人工移植而传播种植于气候条件相似的热带、亚热带地区。中国云南、贵州、西藏喜玛拉雅山东侧的河谷地带，以及喜玛拉雅山西麓印度一侧，都是茶的原产地。四川靠近云南，是茶原产地的边缘地带。所以四川才会出现中国最早、最有价值的茶叶文献——《僮约》。而云贵等原产地有茶的记载，却几近湮没，这显然由于当时该地历史文化条件的局限。

研究茶的传播路线，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饮茶在中国渐渐文化化了，这同茶叶的传播有着密切联系。目前，我们无法确切地找出茶叶传播的路线，但从地理、经济文化等角度着手分析，还能依稀找见茶叶传播的大致脉络。

除了《僮约》之外，四川还有中国最早有关茶叶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中曾描绘周武王汇同四川少数民族起事讨伐殷纣王时，少数民族头领就将巴蜀所产茶叶带去进贡给周武王。志中有“园有芳蒻香茗”的记录。香茗显然是人工园栽之茶。《四川通志》还说：“名山之西十五里有蒙山……即种仙茶之处。”公元前二世纪，甘露寺祖师吴理真就在蒙山顶种下七株茶树。由于其质优秀，从唐朝开始就被列为贡品，并建立御茶园，专为皇家生产茶叶。“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历代被人吟诵，并成为许多茶馆门前必书的楹联，说明蒙顶茶古往今来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茶树移植四川后，最先可能向北迁移。因为当时陕西是西周的政治文化中心，川陕之间的“栈道”当时很有名气，是两省区物资交流的通道。茶随“栈道”移入陕西，由于秦岭山脉抵御寒流的屏障作用，陕南一带温湿的气候极适宜茶叶生长。由于气候所限，茶叶无法向北传播，便调头向东，沿汉水流流域向东周的政治经济中心地河南移动，并在河南南部扎根萌芽。

到战国时代，安徽、山东遂成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茶叶再度东移。到公元二世纪，我们在古代著名的大医学家华佗的《食论》中，可以看到“苦茶久食益意思”的论述。那时候，华佗行医于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以及徐州、盐城、扬州一带，可见当时这一带已有较普通的饮茶风习了。

茶树移入四川之后，又顺长江传入两湖，并经九江入鄱阳湖到达江西，再传入福建。《茶

陵图经》说：“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茶陵这个地名，西汉初年就有。陶潜《续搜神记》载：“晋武帝司马炎时，宣城人秦精常入山采茗。”宣城向东南推移，便是现在的江苏、浙江、以及皖南广大茶区了。《吴志·韦曜传》就有以“茶蒟代酒”的记述。《吴兴记》又记载着：乌程（吴兴）县西二十里有竭山，出御茶。”可见公元三世纪前后，饮茶种茶之风已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区域了。

到了唐代，饮茶种茶之风几乎遍及中国适宜种茶的广大区域。这个时期，茶叶基本完成了传播任务。至于说在小的范围里的传播流变，我们就无法详细介绍了。

茶从野生植物逐步被人认识和引种的历史，又是茶叶被人加工利用的历史。神农氏在山中误食中毒得茶而解的传说，是人类最早利用茶的记录。按传说进行分析，神农肯定是嚼食新鲜茶叶，但也有捡食干叶的可能。我们祖先最早利用茶叶，大致就在这两种范围内。食鲜叶的记载，最早见于《晏子春秋》，说明茶在当时不光光被人们做药物，它也被人们当作佐餐的一种菜蔬。而神农捡嚼干叶的可能，倒让人想起我们的祖先最初的茶叶加工方法，摘叶晒干，这和现在人们采制白茶的做法十分相似。

顺便说一下，茶叶未被加工之前，其理化成分没有发生质变，是不可能具有药效的，不管干茶，还是鲜茶。

唐朝不仅是茶叶广为栽培的年代，而且也是制茶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茶从摘叶晒制，发展到架火蒸青，从散叶到团茶，品种也丰富了。先进的制茶技术不仅要求茶叶内部理化条件发生变化，达到“制”的目的，又要使茶叶外观美观整齐，取得“造”的效果。

明清以后，直到今天，由于因地制宜的栽培管理和精益求精的加工技术，茶叶不仅在质量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在种类方面又较之以往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国茶叶按加工制作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六大类，即绿茶、红茶、花茶、白茶、黑茶（紧压茶，又称砖茶）和乌龙茶。这在明清时期就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茶叶种类的丰富，反映了中国茶叶栽培区域的辽阔，不同的栽培环境，使作物的品质、风味产生明显的差异，而且，物种本身的差异性，又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同时，茶叶种类的丰富，也反映不同茶区的加工、制作，乃至不同区域间文化传承的种种殊异性。中国茶叶品类的丰富，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丰富多彩，品味众多的茶，体现了中国不同区域的民众，对茶有着不同的爱好与口味。从今天中国饮茶习惯上来区分，一般说来，北方人喜爱花茶，尤其在长江流域绿茶拥有大批消费者，而在闽广两省沿海地带，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区域，乌龙茶占有极大的市场。红茶也拥有很大的市场。但红茶的市场不同于上述三种茶，明显拥有区域性，它散布于大江南北。黑茶的销售对象多在西北与塞外，它是游牧民族群众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产量较少的是白茶，产区和销区的分布面也较窄。这种几乎不经人工制作，仍保留着茶芽天然纯真风味的白茶，最能体现中国远古饮茶风采，因而濒临失传，弥足珍贵。

从历史传承上来考察，中国古人对茶的爱好由于时代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汉朝有茶便饮，并不偏爱某个品种的茶。唐朝则不同，唐人“首称阳羡”。阳羡是顾渚紫笋茶的产地，那是一种绿茶。宋朝人却“偏好建州”，建州即今福建建阳。建州是武夷岩茶的代称，属于乌龙茶类。明清以后，由于茶叶栽培面积的日益扩大、茶叶品种日益繁多，唐宋那种集体推崇某种茶为朝代特点的尚茶风习遂告结束。对茶叶多样化的需求和爱好，使茶叶生产出现并保持了多样化的局面。

同时，在饮茶的历史长河中，饮茶的方法也不断更新变化。汉朝以前，茶叶饮用多为生煮羹饮，摘取鲜叶直接入锅煮沸饮用。在远古时代，人们甚至用它做蔬菜，及当成治病的药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茶叶才制成饼状烘干，饮用时需碾碎，常常加以其他香料一并饮用。煮

茶的风习一直沿袭到唐朝。唐初人们还习惯于在茶中添加香料，后来渐渐废除此法，重视起茶叶的真香和原味。

宋朝是中国饮茶发生变化的年代，历史遗留的煮茶在宋朝开始为开水冲泡所取代。但当时的冲泡，还需将整茶碾碎。明清两朝，由于蒸青绿茶逐渐取代炒青绿叶，这种制茶技术揉捻较重，使茶汁溢出，并于干燥时附于叶表，开水一冲，茶味易出。从此，饮茶以冲泡饮法为主了。中国人今天的饮茶方法，实际为明清所遗。

然而，今天由于时代的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速溶茶，袋泡茶应运而生。同时，铁罐装的凉茶，又开始投放市场。似乎人们不再追求茶的真香和原味了，在茶中投加糖、奶、柠檬等添加料的喝法，也颇为时髦地兴起，饮茶的方式遂呈现出更新的趋向。这些我们都将在后面做详尽的论述。

茶作为一种野生植物，渐渐被人们发现和利用，开初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小的。随着茶成为一种生活必须品进入中国人的生活，茶便成为广为栽种的经济作物，遍布中国。从空间上来讲，目前中国北方到山东半岛，南达海南，东至台湾，西抵山南藏北亚热带河谷地带，如此辽阔的区域，都适宜种茶。何况，在如此辽阔的版图上，生活着四十多个不同民族，茶对于他们生活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于茶的多种认识和态度，都使茶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往往是生活中最普遍的事物，最能体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间互为区别的文化标志。

从时间传承上来看，中国人饮茶的时间，几乎等同于埃及人建筑金字塔的时间。茶在中国历经原始氏族社会（有关神农传说，实际是原始社会后期的口头文学作品），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品社会，和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与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影响在人们的思想行为和道德观念上。反过来说，人们的这些观念积代相传，又将潜移默化地成为一种积淀，遗留在对待茶的认识上。茶历经如此繁复的社会阶段，尤其是在封建文化最为灿烂的阶段，茶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消闲的宠物，参与了整个封建文化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灿烂，从兴到衰的整个过程，它最能体现中国封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事实上，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以载道，茶一旦被中国文人以审美的眼光所审视，茶也开始载道了。

茶，从最初的自然界中一种普通的植物，默默无闻地在传播路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一双又双手的递接，渐而扩及全中国，又为中国人所接受，遂成为中国的“国饮”，茶实际上是一种浸透着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绿色植物。

如此说来，茶就不是一种可以等闲视之的饮料了。的确，我们将在这本小册子里对茶进行一次较全面的分析，如果你对中国文化问题感兴趣的话，相信你会有所裨益的。

陆羽与《茶经》

在一个饮茶风习遍布全国的国度里，必然会产生饮茶方面的杰出人物。盛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为世所瞩目。富庶的经济生活，不为衣食奔忙，使人免去世俗生活的忧恼，闲适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级颇有品格的一种人生追求，品茗清谈，海阔天空，自然比终日无所事事显得风雅，何况饮茶在当时还是一件颇为高尚，又能显示身份的消遣。唐朝文人都爱捧一盏茶，悠然自得地在诗文中留下赞美茶的诗句，这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陆羽（公元728—804年），字鸿渐。他于公元758年前后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饮茶专著《茶经》。《茶经》从茶叶的栽培、分布、评定，到饮茶的用水、器具，无不做细致而科学的论

述，内容包罗万象，是一部关于茶的百科全书。由于陆羽在茶方面的突出贡献，他被历代茶商茶农奉为“茶圣”、“茶仙”，是茶业方面的开山祖。在过去，许多茶农家都供有陆羽的牌位，许多茶行茶馆都奉陆羽为“祖师”，年年祭供，香火不绝，祈盼祖师荫庇他们事业发达，生意兴隆。可见陆羽影响之大。

然而，在唐朝浩瀚的文献中有关陆羽的记载却寥若晨星。仅在新唐书中有过极简单的记载：“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上元初，隐苕溪，自称桑苧翁。久之，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末卒。羽尝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茶矣。”

这里说的是陆羽之后，天下方知有茶。说明陆羽对茶的巨大贡献。但新唐书却未能详述陆羽的出生与身世。关于陆羽的身世，是一个不解之谜。相传，陆羽是个弃婴，在竟陵河边被一个叫智积的和尚捡来抚养成大。“稍长，自筮遇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氏，字鸿渐，名羽。”他连姓名都是通过占卦得来的。

陆羽在其自传中也说：“不知何许人。”他说他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他长得其貌不扬，并有口吃，这种人似乎并不可爱。但陆羽尽管口吃，却是个倚才雄辩的人，他自认自己“为性褊躁多自用意”，是个个性狭隘、性情急躁的人，多凭主观想法去做事。与朋友喝酒，友人稍有出言不恭，便拂袖而去。但他又是个极重信用的人，与人相约不管冰雪虎狼挡道，总要履约而去。

陆羽生性聪明，从小学书，没有纸笔，就书以竹画牛背为字。他以刻苦的治学态度，认真学习，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字修养，很难想象他能写出《茶经》这样的著作。陆羽因为不堪忍受寺庙里的痛苦，出走而归隐深山，他在自传中写道：“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不杂非是，名僧高士，谭燕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鞭、短褐、犊鼻。往来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与尽，号泣而归。”完全是一副隐士飘然的模样。

陆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如颜真卿、张志和、释皎然等都有密切的交往。

从《茶经》所取得的成就，以陆羽的知识阅历，治学态度等来看，陆羽绝非等闲人物。

陆羽晚年归隐苕溪以后，一面怀着品茶的绝技，煮茶自娱，一面闭门谢客，刻苦著书立说。这些情况我们是能够想象出来的。但《新唐书》中还记述了他晚年归隐苕溪之后，时常“独行于野中，诵诗击木，恸哭而归。”这又给我们认识陆羽，增加了很多的疑惑。

按理说，陆羽行踪深山野泽之中，既无战祸离乱之忧，又无丧妻亡子之苦，外部环境没有什么施烦于他，那么，他“独行野中”的“恸哭而归”究竟为着什么？他诵的到底是什么诗篇？

倘若仔细考察陆羽的身世及所处时代，我们不难发现安史之乱时，陆羽曾写下的《四悲诗》，扬州刘展在江淮举兵反唐时，他又写下《天之未明赋》等诗篇。可惜这些诗作我们却无法读见，不过，据陆羽自传称，这些作品人们“皆见感激，当时行哭涕泗。”能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还能是什么？——忧国忧民之作。足行于深山野泽中的陆羽，很有一种孤行于汨罗江边的屈原的模样。

佛教云：人生有八苦。说人生一共有八种难以逃脱的痛苦，即生、老、病、死、憎恶聚、爱别离、求不得和五蕴盛。生老病死，这四种痛苦人所难免，相恨的人偏偏要聚在一起，相爱的人却偏偏要分离。这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求不得者，苦苦追求却毫无所得，这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以上这七种痛苦都是可见可知的，至于“五蕴盛”就稍费解些了。五蕴：即眼、耳、鼻、舌等，五种感知外部世界的器官；盛：发达也。五蕴过于发达的意思就是说，它

过于敏感了，它可以感受到一般外人所无法体验到的形而上的那种痛苦，那种心灵上的深深苦感。

那么，陆羽是那种属于心灵敏感的人吗？结合对陆羽身世的考察，我想他应当是这一类人。至少有一点肯定清楚，陆羽对茶有着一种深刻的了解，不然他就无法写出《茶经》。茶能清心明智，又能超然人生。茶按佛教观念来理解，一直被僧人视为一种解脱烦恼的良药。陆羽对茶肯定有一种俗人难以理解的偏爱，这一点想来是不会牵强的。

陆羽是个谜一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留下不朽巨著的人，不仅生前贫困潦倒，而且死后史籍上总是很难觅见其身世记载。写出《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是这样，写出《窦娥冤》的关汉卿是这样，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更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悲哀。

在一些野史和笔记中，我们还能找见关于陆羽零星记载。譬如《蛮欧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陆鸿渐采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焦糜。鸿渐怒，以缆绳缚奴，投火中。”好一个陆羽，竟然有杀人的记录。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不过陆羽爱茶之心由此倒可见一斑了。

相传收养陆羽的智积和尚嗜好饮茶。由于陆羽是煮茶高手，智积非陆羽煮出来的茶不喝。唐代宗皇帝听了这个消息后，即召智积进宫，代宗连忙找来宫中煮茶好手，烧茶端上，谁知智积一喝便皱眉不饮了。代宗传旨密召陆羽进宫，智积刚端起陆羽烧的那碗茶，便连声夸好，皇帝叹服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唐代宗时，李季卿被委任为湖州刺史，他上任途中遇见陆羽。由于李季卿仰慕陆羽的茶艺，便邀他上船同行做客，船泊扬子江边的南零溪口，李季卿特停船差人去取南零水来，请陆羽煮茶。南零水在当时为煮茶的名水。当佣人驾舢舨回船，送上水罐，陆羽便皱眉头，说这水不是南零水，而像江畔之水。佣人连忙辩说就是南零溪水。陆羽不做驳斥，待煮出之茶喝过几巡后，陆羽眉头才稍稍松解，说喝到这会儿，这水才开始像南零水，佣人大惊，连忙跪地述说，原来他取来南零溪水，走到半路不料洒了半罐，连忙舀了半罐江水充数。不想陆羽这等厉害，何处之水一口了然。李季卿当然要刮目相看了。

没有这些传奇的说法与故事的烘托，陆羽是不可能在他死后立刻被人制成陶俑顶礼膜拜，成为茶这个行业的神灵的。

上述传说都很夸张。不过夸张的核心都集中在陆羽对水的了解上。而中国饮茶的奥妙与学问，几乎也都扣在这个水上。古往今来的饮茶大师们无不讲究对水的选择，这说明水对于茶的重要性。没有好水，再好的茶叶也难泡出好味。《茶经》辟有专门章节谈论饮用水。《茶经·五之煮》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蓄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

陆羽认为泡茶最好的水，是山中之水，而且山中之水还要选择，“乳泉、石池慢流者。”这是为什么？很显然，山中之水多为矿泉水，矿物质含量丰富，用矿泉水泡茶是最适宜的。

陆羽的游历很广，对各地的泉水均有细致的品评。他认为全国适宜泡茶的水共有二十个地方，其等级顺序是：庐山康王谷水帘水为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蕲州兰溪石上水第三，峡州扇子山下虾蟆口水第四，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庐山栖贤寺方桥潭水第六……等等。

尽管陆羽足迹未必行遍中国大地，而且他品评划定的等级未必科学。然而，他作为一个普通僧人在交通落后的古代，能为寻水四处云游，同时具有超凡品评能力和记忆力，他的确算得上饮茶的天才了。这从侧面说明，中国饮茶之所以具备了文化属性，表现在它对水做出的选择，突出显示了人对水“味”的一种奇特而敏感的认识。

除了对水质做等级划分之外，茶叶冲泡技术又是饮茶的一项专门技艺。这项技艺首先在生

水烧煮的问题上，表现了饮茶文化的奥妙。《茶经》指出煮茶用水“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以上水老，不可食用。”把生水加温煮沸，按其滚沸的状态做如此细致准确的描绘和定性分析，的确是前无古人，陆羽实为中国饮茶第一人。中国饮茶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奇异的独特性与独到的科学性。

我们都知道，茶是用开水冲泡的，水开的程度（实际指水沸的温度），关系到茶冲出的质量。因此历代饮茶大师对此都有研究。宋朝蔡襄所著《茶录》则说：“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宋徽宗是宋朝皇帝，他对茶也极有研究。他撰写的《大观茶论》，也是一部饮茶专著。书中说到煮茶之水时说：“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续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许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

蟹眼是指水翻沸时的一种状态。陆羽说的鱼目也是这个意思。鱼目和蟹眼都是水刚滚沸时的情景。要把握好水开的程度看来不容易，蔡襄对此有“候汤最难”的感叹。他不同意陆羽“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的划分，按蔡襄的观点陆羽划定为“一沸”的水，已经过熟了。不过，他和陆羽持相同观点都反对用“老”水。老水当然是指久沸之水。宋徽宗对此有高明的补救方法，以新水投之，古代的饮茶大师何以都忌用久沸之水呢？

明朝许次纾所著《茶疏》也是一部有影响的饮茶专著。他指出：“水一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他的见解又和以上几位不同，他的观点认为，这个时候的水恰到好处。“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则汤老则香散，绝不堪用。”

原来奥妙在此，汤老之水泡出的茶没有香味。这才是古人担忧汤的原因所在。茶叶冲泡是一项专门技术，据现代科学证实，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茶，因冲泡的水量不同，水温不同，浸出的茶汤中化学成分就不尽相同，茶叶的风味就相去甚远了。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会细细品尝茶的风味，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如何品辨茶的风味，而陆羽呢，则是中国饮茶第一人。

当麦克唐纳公司以跨国的步伐，将汉堡包推向世界时，科学的制作方法，严格的选料标准和统一的质量规范，保证了这种方便食品的统一风味。无论你在世界任何角落吃到汉堡包它的风味必定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汉堡包的风味是一样的，但麦克唐纳的总裁和股东们绝不会想到，这种一统化的食品固然可以省却人们的时间，可以让人们适应高速度高节奏发展的工业社会，但它丧失的却是食品的风味与个性。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相当严肃地指出，当世界只剩下一种模式支配时，人类社会将面临多么枯燥的格局。这当然是句后话了。

陆羽会喝茶，然而，茶在陆羽看来似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茶。

陆羽是位品性高洁的人，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要不然不会被朝廷召为文学的。史料记述他“学赡辞逸，诙谐纵辩”、“聪俊多能”，这些杰出的才能和他与生俱有的相貌上的丑陋，生理上的口吃所带来的心灵上的痛苦，往往可能会造成一种落差和扭曲，倘若我们将这些联系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分析，我们大概可以理解陆羽何以时常“独行野中，诵诗击木，恸哭而归”了。

我们前面说过陆羽是心灵敏感的人，他同时又是个极富情感的人。唐李肇《国史补》载：“羽少事竟陵禅师积智。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作诗寄情。”诗云：“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念父感恩之情也如西江之水，滔滔涌来，无不泄于纸上。

可惜，这是我们所能见到陆羽的作品，除《茶经》和自传之外，唯一的一首诗了。据陆羽自传记载，他的一生著述颇丰，绝大多数均已失传。

陆羽交友甚广，游历也颇丰富，又是个崇尚大自然归隐山水的文人。但我们不该忘记他是

个出生寺庙的僧人，佛学的教义与学说，曾深深浸润过他的灵魂。为什么中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会出自唐朝僧人的手上，的确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唐代著名诗人皇甫曾与陆羽交情甚深，他与陆羽多有唱酬，他在《送陆鸿渐山人采茶》中写道：

千峰等逋客，春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美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磬声。

诗以“深处”、“烟霞”、“独行”、“野饭”勾绘出一幅清淡幽野的画面，又以“山寺远”“石泉清”“燃灯夜”“一磬声”等着色，使整首诗显出一种超然淡泊的境界，固然描绘出了采茶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表现了诗人对茶生长环境的那种脱尘超世、宁静幽远的氛围。其情其景所隐涵的则是一种对于人与茶的一种和谐的关系：茶即是人，人即是茶。

还有，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皇甫冉也留下了与陆羽交往的诗作——《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云：

采茶非采绿，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

又是“上层崖”，“白日斜”，“山寺路”、“野人家”，满纸深邃旷远画墨，一幅山野幽深画轴。不过这首诗明显不同于前一首的地方，即开篇就道：“采茶非采绿”。这是什么意思？采茶当然不是仅仅摘采绿色植物。“远远上层崖”，野茶生长环境？采摘之危险艰难？或许两者兼而备之。“试问王孙草”，假如要问那些艳丽富贵的花草，“何时泛碗花”？它们当然无法像茶那样在碗泛起白色的泡沫，悠悠的清香。那么“采茶非采绿”究竟要采的是什么呢？“远远上层崖”则是一种遥不可期，高不可攀的境界了。是什么，恐怕连作者都可能不知其所以然吧。

事实上，陆羽同时代的人对于陆羽，以及陆羽与茶相互关系所隐涵的，都不甚了解。他们尊重并推崇陆羽是因为陆羽会喝茶，懂得茶艺，并写出了《茶经》。然而，为什么《茶经》会出自陆羽之手，而非别人之手，同时陆羽为什么要写《茶经》，探索这些问题对了解中国茶文化的特点，恐怕是不无益处的吧。

明代学者兼诗人冯时可似乎对此有些思考，他在其所著《茶录》中说：“鸿渐伎俩磊块，著是《茶经》，盖以逃名也，示人以处其小，无忘于大也。”

冯时可告诉我们的不光是陆羽那种借茶浇胸中之磊块的品格，“以处其小，无忘于大。”什么是小？区区饮茶，当然属小。什么是大？天地、山川、自然，乃至人生、社会、宇宙，应当为大。

释皎然是陆羽的好朋友，与陆羽交往过从甚密，应当说对陆羽是相当了解的。在皎然和尚眼中茶与禅是划了等号的。他在《饮茶歌》中说：“……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这“道”指的是“茶道”，他在同一首诗中说：“孰知茶道全尔真。”茶道中所表现出来的哲理与精神，不仅全面，而且是博大精深的。

对此，几乎得到同时代诗人的集体认同。韦应物对于茶赞不绝口，诗云：“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固理君除，率而植荒园。愿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茶性是清洁的，这指的是茶的品性，洗涤尘烦恼，这是茶的功效，而茶“此物”中的“灵味”，只能与“幽人”对谈了。

谈什么？当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茶了。

现在，有必要让我们的话题，稍稍涉及“味”这个字眼。茶叶从最初被视为药品，到广泛栽培种植，成为广大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饮料，只能说明物种的普及程度。饮茶之所以具有文化意味，就体现在中国人对茶“味”的品辨上。品茶大师喝的不是茶汤，而是品辨茶的性味。他们不是以实用态度，诸如待客，解渴的要求对待茶，而是用一种艺术与人生的眼光对茶进行审视。

这里说的“味”，就不是指感官上的滋味，而是艺术范畴内事物的某种品格与旨趣。这是中国文人经常使用的语汇。

无论中国古典美学传统，还是中国现当代各种美学思潮，无论流派如何纷呈，各家见解如何殊异，他们对待——“味”，基本可以理解为是艺术趣味的问题。中国艺术的风貌就是含蓄，含而不露，露而有节，留出充分的余地与空间。

这种“味”既是一种趣味，也是一种创造性的主观发挥，与此有近似含意的还有“韵”，一种旨在对事物内在精神进行观照的概括；还有“神”，一种凝聚着事物内在特征个性化神态与气韵等等。它们与“味”的共同特点，即——走出实象。

应当说，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茶与佛教

为什么中国的饮茶大师，既不产生于唐朝的文学家里，也不出在唐朝的政治家中，偏偏出自唐朝的寺庙里。这个问题的确是很有趣的。当我们分析完陆羽的身世、品行，以及《茶经》之所以出现的各种内在原因之后，相信读者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品茶大师之所以出自佛家寺庙，说明茶与佛教有着某种密不可割的联系。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上溯到原始图腾崇拜时期。人对生的迷惑和对于死的畏惧，这种与生俱有的痛苦，迫使人向宗教求索。宗教以其解释世界的使命，按照不同的教义给信徒以不同的回答。

佛教对世界的基本解释是：认为现实人生“无常”、“无我”和“苦”。而“苦”的原因来源于每个人自身的“惑”。要解决“惑”给人带来的痛苦，其方法就是持戒修行，从而彻底地转变自己的世俗认识与欲望，超出生死轮回的范围，达到“涅槃”的境界。这就是佛教的解脱。

佛教的修行内容，不外乎“戒”“定”“慧”三种。戒律是修行的首要律条，戒律要求僧侣将酒、肉、性欲等予以戒除，以达到清与洁的本性；定律是修行具体办法，息心静坐，无思无虑，类乎睡眠状态，但并非真正睡眠的坐禅入定，反而要求人思想高度集中、静化、摒除一切杂念，聚思于悟道。弃酒抑欲，久坐困乏，又要求思绪澄清，因此，茶便成为佛家信徒的不可取代的良药，并深深地在寺庙扎下了根。

据唐封演的《封氏闻见录》记载：

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师者务必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

这是寺庙普及饮茶一条有趣的记录。据《茶经》记载，公元346年，敦煌僧人单道开，曾昼夜不卧，不畏寒暑，能诵四十余万言，是个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之所以有这种功能，除吃食物与药物外，据称常饮一种“茶苏”。据研究，“茶苏”是一种相当于现在游牧民族日常饮用的奶茶、酥油茶之类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是什么类似的茶，关键是茶开始在佛门里出现了，